

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吗?*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田北海^{1,2} 徐 杨^{1,2}

摘要：论文从孝道转型视角出发，基于 CHARLS2015 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比较分析了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类型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不同子系统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受空间限制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但强化了不受空间限制的经济支持。较之对生活完全可以自理的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对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度更大；较之成年女儿外出的影响，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可见，成年子女外出并未全面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而是推动家庭养老由“侍奉在侧”型向“成就安心”型转变；成年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并未扮演替代性角色，而是仍旧扮演着辅助性角色。为此，应加快推进就地城镇化，大力发展农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服务，倡导孝亲敬老的美好家风。

关键词：农村社会流动 家庭养老 代际支持 孝道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有数千年的孝道传统，长期以来，家庭养老一直在城乡养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甚发达的农村社会尤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但流动的不完整性（刘畅等，2017）使农村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不能随成年子女一同流动。父母与子女生活空间的分离，使传统“侍奉在侧”式的家庭养老变得不再现实，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不可避免地因成年子女外出而受到影响。

成年子女外出是否必然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到

*本文为中国工程院 2018 年度咨询研究项目“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ZD-15-0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662020WFPY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底存在什么影响？上述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冲击了孝道观念（Hugo, 2002；王彦方、刘旭涛，2014），弱化了孝道的约束力（刘艳军、朱慧玲，2007），甚至导致孝道衰落（贺雪峰，2008），进而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张文娟、李树茁，2004a）。也有学者认为，外出子女的孝顺观念没有因城市化而发生明显变化，流动对子女的养老支持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张烨霞等，2008）。因此，成年子女外出并未弱化家庭养老（杜娟、杜夏，2002），也没有改变家庭养老责任和家庭整体功能（辛妍，2012）。

学术界之所以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因为较少有学者关注成年子女外出模式的多样性、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异质性及家庭养老支持的多维性。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笔者尝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以下简称 CHARLS）2015 年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将成年子女外出状态划分为所有子女外出、部分子女外出和无子女外出三种类型，首先考察三种状态下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养老不同子系统（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支持获得的差异；其次比较分析成年子女外出对不同自理能力状态下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异同；再次比较分析成年儿子外出和成年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影响的性别差异；最后在理论上对农村孝道变迁走向、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责任分工、家庭养老的需求弹性等问题进行回应，在实践上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一直在中国养老体系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就其内涵而言，家庭养老是以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为养老资源主要供给主体的养老体系。就其外延而言，家庭养老包含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个不可分割的子系统。家庭养老的三个子系统分别对应于老年人不同类型的养老支持需求，受时空制约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不同子系统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可能也不尽相同。

（一）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的影响

对于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的影响，学术界分别形成了经济支持强化论、经济支持弱化论和经济支持无影响论三种观点。

1. 经济支持强化论。基于资源条件视角的研究指出，流动使子女收入增加，提高了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赡养能力（Zúñiga and Hernández, 1994；李全棉，2004）和经济支持力度（白南生等，2007）。基于代际交换视角的研究指出，在成年子女外出背景下，老年人成为农村家庭隔代抚养的主要供给者，隔代抚养家庭的老年人会因照顾孙辈而获得更多经济支持（Silverstein, 2008）。基于需求视角的研究指出，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是其养老需求的一个函数，越是有需求的老年人，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张烨霞等，2008）。也有学者从养老资源补偿视角指出，为了弥补因外出导致的老年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缺位，外出子女往往会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Velkoff, 2001）。

2. 经济支持弱化论。有学者从家庭资源稀释效应视角指出，成年子女虽因流动而收入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收入多用于应付城市高消费生活（周祝平，2008）、回县城购房（聂洪辉，2017）或建房（高

瑞琴、叶敬忠, 2017)、结婚彩礼(杜鹰, 1997)、子女教育(胡枫、史宇鹏, 2013)和人情往来(叶敬忠、贺聪志, 2009)等方面, 父母往往处于家庭资源分配的末梢(钟曼丽, 2017)。因此, 成年子女外出会弱化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有学者从孝道衰弱视角指出, 城市化削弱了流动人口的孝道观念(Wilensky, 2002), 从而导致出现了“赡养脱离”、“富而不养”问题(叶敬忠、贺聪志, 2009)。

3. 经济支持无影响论。有学者从需求弹性视角指出, 多数农村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周祝平, 2008), 只要还能干活, 他们都会选择自食其力(贺聪志、安苗, 2011), 因而不指望或不需要子女支持, 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并无影响。另有学者从资源约束效应视角指出, 农村老年人只能从成年子女外出中获得有限补偿, 其经济资源(舒玢玢、同钰莹, 2017)、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宋璐、李树茁, 2017)并未因成年子女外出而直接增加。

(二) 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生活照料的影响

对于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生活照料的影响, 学术界形成了生活照料弱化论和生活照料无影响论两种观点。

1. 生活照料弱化论。学者们主要基于空间分隔效应视角指出, 成年子女外出造成子女与老年父母的空间分隔, 导致家庭生活照料者减少(孙鹃娟, 2006), 制约了老年人的家务以及日常生活起居照料等方面的支持获得(Zimmer and Kwong, 2003; 张文娟、李树茁, 2004b), 降低了家庭养老生活照料资源的可获得性(胡强强, 2006; 宋璐、李树茁, 2008)。

2. 生活照料无影响论。性别视角的研究指出, 女性是老年人生活照料的主体, 中国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未发生变化, 丈夫外出、妻子留守的流动模式大量存在。在仅有男性劳动力外出的家庭, 成年子女外出不会对老年人生活照料产生太大影响(陈彩霞, 2000)。即便有女性劳动力外出, 女性留守老人也可以替代子女承担男性老人的生活照料责任(贺聪志、叶敬忠, 2010)。也有学者基于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特征指出, 在农村多子女家庭,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家庭占比不高, 多数老年人至少有一个子女与其共同居住或相邻而居, 其生活照料并未受到影响(Zimmer et al., 2007)。还有学者基于需求视角指出, 能够自我供养且没有重大疾病的农村留守老年人, 基本不需要子女照料(谷玉良, 2018), 能够完全自理或者部分自理的老年人也会努力自我照料(贺聪志、叶敬忠, 2009)。

(三) 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精神慰藉的影响

对于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精神慰藉的影响, 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 也基本形成了“精神慰藉弱化论”和“精神慰藉无影响论”两种观点。

1. 精神慰藉弱化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关注成年子女外出的生活空间分离效应, 认为成年子女外出使代际之间长期分离、交流阻断(Antman, 2010), 导致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缺失(Miltiades, 2002; 蔡蒙, 2006), 加重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与失落感(Adhikari and Jampaklay, 2011)。

2. 精神慰藉无影响论。有学者从孝道转型视角指出, 成年子女外出是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一种新形式。较之在村内碌碌无为, 子女外出成就一番事业, 也是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穆光宗, 2004)。有学者从需求层次视角指出, 成年子女外出让隔代照料成为可能, 农村老年人能在隔代照料中实现自我价值, 从而得到相应的精神慰藉(卢海阳、钱文荣, 2014)。与此同时, 孙辈是老年人与子女保持关系的

重要纽带。借助这个纽带，农村老年人通过隔代照料强化了与成年子女两代人的情感交流（张文娟、李树茁，2004b）。

（四）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综上，对于成年子女外出是否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这一问题，学术界远未形成共识。其争论的根源在于：学者们对于城乡流动背景下中国农村传统孝道的变迁走向、家庭养老涵义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就城乡流动背景下农村孝道的变迁走向而言，持中国农村传统孝道式微论的学者往往从消极视角出发，侧重关注或强调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家庭养老的负面影响；持中国农村传统孝道韧性论的学者往往从积极视角出发，侧重关注或强调成年子女外出的增收效应、养老资源补偿效应、隔代抚养效应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积极影响。就对家庭养老涵义的理解而言，在家庭养老内容方面，有学者侧重强调物质层面的经济支持，有学者侧重强调精神层面的情感慰藉，也有学者侧重强调日常生活照料；在家庭养老形式方面，现有研究多将家庭养老理解为“侍奉在侧”式传统养老模式，忽视了大流动背景下及互联网时代家庭养老方式的新变化。

综上，现有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研究内容上，多数研究往往关注成年子女外出对于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单个子系统支持的影响，较少系统分析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各子系统的影响，比较分析的成果亦不多见。第二，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忽略了成年子女外出状态的多样性，往往把成年子女外出状态简单二分为有成年子女外出与无成年子女外出两种类型，未能区分所有成年子女外出和部分成年子女外出对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影响的差异性，未能深入分析成年子女外出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有无差异，亦未探讨儿子外出和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有何异同。第三，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为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忽略了是否外出是成年子女自我选择的结果，因而存在选择性偏差。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来估计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时，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

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 CHARLS2015 年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家庭养老系统视为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于一体的三维养老系统，依据农村老年人成年子女外出数量，将成年子女外出状态划分为无成年子女外出、部分成年子女外出和所有成年子女外出三种类型，比较成年子女外出不同类型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不同子系统支持获得的差异；从需求视角出发，比较分析完全自理农村老年人和自理能力受损农村老年人在成年子女外出不同状态下家庭养老不同子系统支持获得的差异；从性别差异视角出发，将成年子女外出状态进一步划分为所有成年儿子外出、部分成年儿子外出、无成年儿子外出、所有成年女儿外出、部分成年女儿外出和无成年女儿外出六种类型，比较分析成年儿子外出和成年女儿外出不同状态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不同子系统支持获得的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在理论上对农村孝道变迁走向、家庭养老的需求弹性问题、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责任分工等问题进行回应，在实践上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孝道转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对于子女外出是否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这一问题，学术界的认知分歧源于传统孝道式微论和传统孝道韧性论两种视角之间的对立。中国传统孝道式微论主要基于传统立场评判传统孝道的变迁走向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支持的消极影响，但忽视了家庭养老支持系统的复杂性和成年子女家庭养老支持策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忽视了传统孝道的发展性与自适应性。传统孝道韧性论主要关注子女对孝道观念的高度认同、赡养义务的完整保存以及父母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认同，并由此得出子女外出并未弱化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结论，但忽略了孝道形式化保持背后孝道内容的实质性变化（田北海、马艳茹，2019）。

无论是传统孝道式微论，还是传统孝道韧性论，都是基于传统—现代的二分对立视角来阐释传统孝道的变迁走向及其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1983）。对传统孝道变迁走向的理解，不能脱离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更不能脱离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另一方面，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会长期交织并存、相互作用。作为传统—现代连续体上的重要一环，中国传统孝道与其说是在弱化，或者仍然具有强大的韧性，不如说正在发生转型（田北海、马艳茹，2019）。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2011），与西方社会权利与义务观念不同的是，维系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运行的是情感的流露和亲情的联络（潘光旦，1993）；作为农耕文明的历史沉淀物，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在农村社会仍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田北海等，2012）。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经商既可能拓展其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增强其行孝的经济实力，也可能动摇传统孝道的空间基础，弱化其对老年父母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进而推动家庭养老由“侍奉在侧”型向“成就安心”型转变。

（二）研究假设

1. 空间分离与农村家庭养老支持

代际团结理论认为，代际团结是一个亲子互动的多维度概念。其中，功能性团结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和资源互换情况，联系性团结是指家庭成员联系的频率和模式（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无论是以农村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还是以城市家庭或农民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代际关系研究均表明，子女普遍认同孝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是传统亲子关系的基础（Guo et al., 2009；崔焯、靳小怡，2015；马春华，2016），但空间距离可能影响家庭代际互动的机会，增强或限制代际联系和资源交换的频率和类型（黄庆波等，2017）。

在当下中国农村，成年子女外出是农村生计资源不足时做出的选择。从资源条件视角来看，一方面，子女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有助于其获取更多的生计资源，提升其生计水平，进而增强其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基础与能力。另一方面，子女外出会导致代际居住空间分离，提高其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甚至是机会成本，导致其无法对老年父母提供长期的、持续的、及时的生

活照料。此外，较之在农村，人们在城市面临的竞争压力、生活成本要大得多。在繁重的工作生活压力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成年外出子女的闲暇生活时间被大大压缩，可能与老年父母疏于联系，在精神慰藉方面显得有心无力（刘汶蓉，2012）。

从资源补偿视角来看，外出固然会限制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日常联系，影响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但不仅不会中断代际间的经济往来（王跃生，2006；刘慧君、韩秀华，2014），反而强化了子女的经济支持责任或意愿，激励子女通过强化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来弥补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支持方面的不足（Cong and Silverstein, 2011）。

从需求响应视角来看，农村父母可能会因成年子女外出而调整孝道期待。他们不奢望子女侍奉在侧，也不一定指望子女给予多少实质性帮助，但他们普遍期望子女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其孝行，从而让他们能够在注重人情和面子的乡土社会挺直腰杆，获得邻里认可。在诸多孝行中，经济支持是最具彰显度的表达方式。为此，成年子女外出也可能强化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期待（Guo et al., 2009；Luo and Zhan, 2012）。在孝道伦理依然具有强大形塑力的背景下，成年子女只要具备起码的经济条件，都会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期待给予响应。

综上，本文提出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家庭养老支持的空间分离效应假设如下：

假设 1：成年子女外出会强化不受空间制约的农村家庭养老经济支持，但会弱化受空间制约的农村家庭养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支持。

2.需求弹性与农村家庭养老支持

在孝道伦理依然具有强大形塑力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支持是老年人家庭养老需求的一个正向函数。只要条件允许，成年子女都会根据老年人需求，尽其所能地提供相应的养老支持。然而，成年子女外出往往伴随着家庭养老支持条件的改变，即：经济支持能力的强化和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条件的弱化。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养老支持条件的改变对不同类型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其原因在于：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需求本身是有弹性的。

已有研究表明，在影响老年人养老支持需求弹性的诸多因素中，身体机能是一个硬约束条件（田北海、王彩云，2014）。相对而言，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家庭养老需求弹性较高。更准确地说，他们对家庭养老支持的需求既不迫切、也不强烈，他们甚至乐意“恩往下流”，继续为成年子女贡献余热。相应地，家庭养老支持条件的改变对其养老支持的冲击可能并不显著。与之相对应，自理能力受损的老年人身体机能较差，其养老支持需求是刚性的，突出表现为其对日常生活照料的需求既迫切且强烈。倘若成年子女外出，其生活照料需求只能通过购买社会养老服务得到满足，从而产生经济支出压力，进而强化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需求，而这些需求一般能够得到外出成年子女的响应。

综上，本文提出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家庭养老支持的需求弹性效应假设：

假设 2：较之对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对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

3.成年子女外出的性别组合差异与农村家庭养老支持

在中国传统社会，“养儿防老”既是家庭代际关系反馈模式的文化基础（费孝通，1983），也是确

保“老有所养”的社会规范基础(穆光宗, 2004)。在“养儿防老”伦理规范影响下,儿、女被寄予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儿子独享继承宗祧和家庭财产的权利,女儿则被排斥在外。相应地,农村老年人普遍期待由儿子养老(Luo and Zhan, 2012; Cong and Silverstein, 2014),儿子成为家庭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儿子养老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养老模式(Yang, 1996; Xie and Zhu, 2010)。

近年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聂焱, 2008),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家庭结构变迁、子代相对父代权力的上升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张翠娥、杨政怡, 2015),女儿对原生家庭的情感和现代性意识日益增强(钟涨宝、杨威, 2017),在娘家父母家庭养老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唐灿等, 2009)。有学者指出,女儿已成为农村家庭养老的新兴主体,甚至承担了比儿子更多的赡养责任(朱明宝、杨云彦, 2016)。也有学者指出,女儿的赡养行为多是非正式、发自内心的(唐灿等, 2009)。女儿仅仅是分担而不是替代了儿子的养老责任,是家庭养老的辅助者而不是主要承担者;女儿可以平分情感,但儿子养老的主导模式并未改变(高修娟, 2014; 望超凡、甘颖, 2019)。可见,传统社会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至今仍有很强的文化韧性,农村地区整体上仍然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张驰等, 2019)。相应地,较成年儿子外出,成年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综上,本文提出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家庭养老支持影响的性别组合差异假设如下:

假设3:较之成年女儿外出,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简称CHARLS)。该项调查在全国18个省150个县区的450个村(社区)展开,每隔2年追踪一次,旨在收集一套老年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基于研究设计和相关变量的可获得性,本文选用CHARLS2015年调查数据展开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筛选。首先,选择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样本;其次,剔除非农户口样本;再次,剔除无家庭养老支持需求的样本;最后,进一步剔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错填以及不符合条件的样本,最终得到3816个有效样本。

(二) 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获得,包括家庭经济支持获得、家庭生活照料获得、家庭精神慰藉获得3个子变量。其中,家庭经济支持获得变量操作化为受访者或其配偶过去一年中从每一个没住在一起的孩子处获得的钱和物(折算成人民币)的平均值。家庭生活照料获得变量操作化为虚拟变量,0表示未从子女处获得家庭生活照料,1表示获得了子女的家庭生活照料。问卷首先询问了受访者是否存在身体功能障碍,即:在穿衣、洗澡、吃饭、上下床、上厕所、做家务、做饭、购物、打电话、吃药方面是否有困难。如果受访者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有困难,则进一步询问其主要帮助者是谁。如果受访者回答帮助者为其子女,则视为老年人获得了家庭生活照料支持,赋值为1;反之,视为未获得家庭生活照料支持,赋值为0。家庭精神慰藉获得变量操作化为老年

人与子女见面、联系（电话、短信、信件等）的频率两个问题，并取两个问题的算术平均值。得分越高，表明老年人与子女见面、联系越频繁，老年人从中获得的精神慰藉越充分。

2.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成年子女的外出状态。成年子女的外出状态基于问卷中“子女在哪里常住”这一问题进行划分。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只要成年子女常住地不在本县（市），均视为成年子女外出。根据外出成年子女的人数，将成年子女外出状态划分为所有成年子女外出、部分成年子女外出和无成年子女外出三种类型。在 3816 个老年人样本中，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样本共 861 个、占比 22.56%；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样本共 2312 个、占比 60.59%；无成年子女外出的样本共 643 个，占比 16.85%。

表 1 为成年子女外出不同状态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1 可知，过去一年中，在经济支持方面，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从每个子女处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均值 1721.17 元，显著（ $p<0.001$ ）高于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1498.15 元）；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从每个子女处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均值为 2632.07 元，显著（ $p<0.001$ ）高于无成年子女外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在家庭生活照料方面，在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中，14.8%的样本获得了家庭生活照料，显著（ $p<0.001$ ）低于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家庭生活照料的样本比例（19.3%）；在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中，4.9%的样本获得了家庭生活照料，显著（ $p<0.001$ ）低于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家庭生活照料的样本比例。在精神慰藉方面，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与孩子见面、联系的频率均值为 4.80，显著（ $p<0.001$ ）低于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与孩子见面、联系的频率（6.57）；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与孩子见面、联系的频率均值为 3.91，显著（ $p<0.001$ ）低于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与孩子见面、联系的频率。

表 1 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状态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均值)

家庭养老支持项目	全样本	有成年子女外出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	部分成年子女外出	无成年子女外出
经济支持获得（元）	1683.588	1721.166	2632.074	1381.940	1498.152
生活照料获得	0.156	0.148	0.049	0.185	0.193
精神慰藉获得	5.101	4.802	3.905	5.137	6.572
观测值	3816	3173	861	2312	643

3.匹配变量。本文选取了三类匹配变量：一是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农村老年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年收入和健康状况。二是老年人子女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子女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是老年人家庭特征变量，即老年人在世子女数。本文讨论了农村老年人自理能力状态的分组匹配结果，故将农村老年人自理能力状态也纳入表中，表 2 为被解释变量和匹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N=3816)

变量名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经济支持获得	受访者从所有子女处获得的钱、物算术平均值（元）	1683.59	3960.02	0	143000
家庭生活照料获得	受访者从子女处获得的生活照料：无=0，有=1	0.16	0.36	0	1
家庭精神慰藉获得	受访者与子女见面、联系频次的算术平均值： 几乎没有=0，每年一次=1，每半年一次=2，每三月一次=3，每月一次=4，每半月一次=5，每周一次=6，每周二到三次=7，每天=8	5.10	1.743	0	8
协变量					
性别	受访者性别：女=0，男=1	0.541	0.498	0	1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68.675	6.860	60	102
婚姻状况	受访者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0，已婚=1	0.693	0.461	0	1
教育程度	受访者教育程度：未受过教育=1，未读完小学=2，私塾=3，小学=4，初中=5，高中=6，中专=7，大专=8，本科及以上=9	2.608	1.587	1	9
年收入	受访者及配偶上一年收入	1325.94	4656.03	0	70000
健康状况	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很好=1，好=2，一般=3，差=4，很差=5	1.741	0.564	1	3
子女平均年龄	在世子女年龄的算术平均值（岁）	40.663	6.851	19	72.4
子女平均教育年限	在世子女受教育年限的算术平均值（年）	4.334	1.489	1	10
子女数	在世子女数量	3.530	1.521	1	11
自理能力状态	受访者自理能力状态：自理能力受损=0，完全能自理=1	0.514	0.500	0	1

(三) 分析模型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成年子女外出是否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如前所述，由于成年子女是否外出可能具有选择性偏差，即这一行为的发生并不是随机的，若用简单回归分析估计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其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因此，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以下简称 PSM）方法，通过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分组匹配，来估计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简称 ATT）。

PSM 最早由 Rosenbaum 和 Rubin 在 1983 年提出，在经济学中多用于评估某项目或政策实施后的“处理效应”，是一种“反事实估计”分析方法。PSM 主要内容是为处理组（Treated Group，在本文中指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反事实”控制组（Control Group，在本文中指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然后得到两组样本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 ATT 之差。

在本文中，以虚拟变量 $D_i = \{0, 1\}$ 表示农村老年人是否有成年子女外出，其中，1 为处理组，0 为控制组；将农村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家庭养老支持记为 y_i 。 D_i 对 y_i 的处理效应为：

$$y_i = \begin{cases} y_{1i} & \text{若 } D_i = 1 \\ y_{0i} & \text{若 } D_i = 0 \end{cases}$$

其中, y_{1i} 表示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家庭养老支持, y_{0i} 则表示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家庭养老支持。本文想要知道 $y_{1i} - y_{0i}$, 即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处理效应, 即:

$$y_i = (1 - D_i)y_{0i} + D_i y_{1i} = y_{0i} + (y_{1i} - y_{0i})D_i$$

那么“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为:

$$\begin{aligned} ATT &= E[y_{1i} - y_{0i} | D_i = 1, p(X)] \\ &= E[y_{1i} | D_i = 1, p(X)] - E[y_{0i} | D_i = 1, p(X)] \end{aligned}$$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常见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有很多, 如最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等。笔者依次使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了匹配分析, 其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限于篇幅, 本文仅展示了最近邻匹配分析结果。

五、估计结果与相关检验

(一) 倾向得分匹配的基本检验

首先, 将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作为处理组, 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作为控制组进行匹配。由表 3 可知, 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 较之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463.65 元, 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5.6%, 获得精神慰藉的频次平均减少 1.169 个单位。以上处理效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次, 将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作为处理组, 其他农村老年人作为控制组进行匹配。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 较之部分成年子女外出或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805.60 元, 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9.6%, 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减少 1.978 个单位。以上处理效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最后, 将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作为处理组, 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作为控制组进行匹配。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 与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相比,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906.37 元, 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7.9%, 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减少 1.591 个单位。以上处理效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无论在何种流动模式下, 成年子女外出都强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获得, 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照料获得和家庭精神慰藉获得, 空间分离效应假设得到验证, 即假设 1 得到验证。从代际团结视角来看, 在农村社会, 孝道仍然是规范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代际关系的基础伦理, 为老年父母提供养老支持仍然被视为子女“报亲恩”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孝道伦理

作用下，外出不会弱化成年子女的孝心，亦不会全面弱化成年子女的孝行，只会影响成年子女行孝的具体形式。相应地，不受空间分离效应影响的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获得不但没有被弱化，反而得到强化；受制于空间分离效应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和家庭精神慰藉获得受到弱化。从资源条件视角来看，一方面，外出拓宽了成年子女的收入渠道，提升了其收入水平，增强了其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条件和能力。相应地，平均而言，较之无成年子女外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有成年子女外出或全部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外出导致成年子女与农村老年父母的居住空间分离，繁重的工作负担和城市竞争压力压缩了成年子女的闲暇生活时间与空间，弱化了成年子女“伺奉在侧”、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时空条件。相应地，平均而言，较之无成年子女外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有成年子女外出或全部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比例较低、获得精神慰藉的频次较低。从资源补偿视角来看，外出确实影响了成年子女对农村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但在强大孝道伦理的规制下，成年子女会通过强化对农村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来补偿上述两方面的缺失。

表3 成年子女外出不同状态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平均处理效应

家庭养老支持项目	有成年子女外出 (控制组：无成年子女外出)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 (控制组：无成年子女外出或 部分成年子女外出)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 (控制组：部分成年子女外 出)
家庭经济支持获得	463.647***	805.603***	906.373***
家庭生活照料获得	-0.056**	-0.096***	-0.079***
家庭精神慰藉获得	-1.169***	-1.978***	-1.591***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二) 异质性检验

1. 异质性检验一：基于农村老年人自理能力状态的分组匹配检验

为检验假设 2，本文将样本老年人按自理能力状态进行分组匹配，分析不同自理能力状态下，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模式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见表 4）。

对完全可以自理老年人组的匹配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较之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458.08 元，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减少 1.333 个单位，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可以从需求弹性视角作出解释。完全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即使有生活照料需求，但这种需求也是极富弹性的，或者说需求水平很低、可有可无。作为对弹性需求的响应，多数成年子女认为没有必要为完全可以自理的老年父母提供生活照料支持，也较少为其提供相应支持，从而导致成年子女是否外出对老年父母生活照料的弱化效应并不显著。较之无成年子女外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946.15 元，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下降 1.89 个单位，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减少 1.618 个

单位，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获得的经济支持有所增加，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完全可以自理的老年人组中，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弱化效应非常稳健，对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强化效应比较稳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影响始终不显著。

对自理能力受损老年人组的匹配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较之无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减少 1.300 个单位，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获得的经济支持有所增加，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可能原因是：在 3173 个“有成年子女外出”的样本中，有高达 72.9% 的老年人仅有部分成年子女外出。在仅有部分子女外出的样本组中，一方面，从资源条件视角来看，部分成年子女外出固然增强了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条件，但留守子女的经济条件并不一定得到同步改善。受多子女经济支持条件分散效应的影响，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虽有所增加，但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从代际团结和养老责任分工视角来看，在孝道伦理的影响下，部分子女外出可能弱化了该外出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生活照料，但受多子女家庭养老责任共担和角色互补规范的影响，留守子女会承担更多的生活照料责任，从而弥补了部分子女外出导致的生活照料不足问题。因此，在部分子女外出样本组中，农村老年人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并不显著。较之无成年子女外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1042.12 元，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19.9%，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减少 1.911 个单位，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部分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所有成年子女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827.89 元，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16.6%，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增加 1.300 个单位，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自理能力受损的老年人组中，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弱化效应非常稳健，对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强化效应和生活照料的弱化效应比较稳健。

综上，较之对完全可以自理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所有成年子女外出对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假设 2，即需求弹性效应假设得到验证。在生活照料维度，自理能力状态不同，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需求弹性不同。对于完全可以自理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其生活照料需求具有较大弹性，或者说基本没有生活照料需求。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外出，多数成年子女均无须为老年父母提供生活照料支持。相应地，成年子女外出虽然弱化了完全自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获得，但这种弱化效应并不显著。对于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其生活照料需求是刚性的，成年子女外出意味着其家庭生活照料主体的缺场。因此，成年子女外出显著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照料获得。在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维度，对于处于不同自理能力状态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其家庭养老支持需求弹性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无论处于何种自理能力状态，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获得均会因子女外出带来的资源条件强化效应和资源补偿效应而增加，其精神慰藉获得都会因子女进城遭遇的闲暇时间压缩和空间分隔效应而弱化。

表 4 不同自理能力状态下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平均处理效应

自理能力状态	家庭养老支持项目	有成年子女外出 (控制组: 无成年子女外出)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 (控制组: 无成年子女外出或部分成年子女外出)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 (控制组: 部分成年子女外出)
完全可以自理 (N=1961)	经济支持获得	458.078**	946.153***	482.136
	生活照料获得	-0.006	-0.014	-0.004
	精神慰藉获得	-1.333***	-1.890***	-1.618***
自理能力受损 (N=1855)	经济支持获得	172.606	1042.122**	827.892*
	生活照料获得	-0.074	-0.199***	-0.166***
	精神慰藉获得	-1.300***	-1.911***	-1.300***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2. 异质性检验二: 基于成年子女外出性别组合模式的分组匹配检验

为检验假设 3, 本文将样本老年人按成年子女外出的性别组合模式进行分组匹配, 分析在成年子女外出性别组合的不同类型下,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差异。

在检验时, 为保持样本的一致性, 本文剔除了仅有成年儿子和仅有成年女儿的农村老年人样本, 得到既有成年儿子、又有成年女儿的农村老年人样本 2981 个。其中, 所有成年儿子外出的样本 651 个、占比 21.84%; 部分成年儿子外出的样本 958 个、占比 32.14%; 无成年儿子外出的样本 1372 个、占比 46.02%。所有女儿外出的样本 1761 个、占比 59.07%; 部分成年女儿外出的样本 869 个、占比 29.15%; 无成年女儿外出的样本 351 个、占比 11.78%。

由表 5 可知, 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表现为: 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 较之无成年儿子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有成年儿子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293.30 元, 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7%, 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增加 1.260 个单位,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无成年儿子外出或部分成年儿子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所有成年儿子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增加 609.58 元, 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4.3%, 获得精神慰藉的频次平均下降 1.46 个单位,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较之部分成年儿子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所有成年儿子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 765.86 元, 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平均下降 4.5%, 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下降 0.592 个单位,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无论在何种外出模式下, 成年儿子外出均显著强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 弱化了家庭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

对成年女儿外出不同状态下的分组匹配检验结果显示: 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 无论在何种成年女儿外出模式下, 成年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影响均不显著。成年女儿外出仅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获得有影响, 其具体表现为: 较之无女儿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有女儿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显著减少 1.073 个单位; 较之部分成年女儿外出或无成年女儿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所有成年女儿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平均显著减少 0.709 个单位; 较之部分成年女儿外出的农村老年人, 所有成年女儿外出的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慰藉频次虽有减少,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成年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

甚微，且不稳健。

综上，较之成年女儿外出的影响，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故假设3得到验证，即性别组合差异假设通过检验。可见，一方面，儿子养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农村社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从角色期待来看，农村老年人对儿子养老的性别偏好仍旧具有稳定性；从角色领悟来看，多数农村儿子依然认可自己应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体责任。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会尽其所能为老年父母提供养老支持。相应地，无论在何种外出模式下，成年儿子外出均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获得有显著强化效应，对其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获得均有显著弱化效应。另一方面，女儿在老年父母的家庭养老支持，尤其是精神慰藉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的。

表5 成年儿子外出和成年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平均处理效应

家庭养老支持项目	成年儿子外出			成年女儿外出		
	有成年儿子外出（控制组：无成年儿子外出）	所有成年儿子外出（控制组：部分成年儿子外出或无成年儿子外出）	所有成年儿子外出（控制组：部分成年儿子外出）	有成年女儿外出（控制组：无成年女儿外出）	所有成年女儿外出（控制组：部分成年女儿外出或无成年女儿外出）	所有成年女儿外出（控制组：部分成年女儿外出）
经济支持	293.301**	609.576***	765.856***	26.608	-61.301	-151.767
生活照料	-0.070***	-0.043***	-0.045*	-0.030	-0.019	0.011
精神慰藉	-1.260***	-1.460***	-0.592***	-1.073***	-0.709***	-0.270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三）平衡性检验

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时，需要注意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状态下农村老年人样本组之间的平衡性问题，即匹配样本在匹配变量分布上不应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对倾向值匹配的分析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

限于篇幅，本文仅将成年子女外出状态按“所有成年子女外出”和“部分成年子女外出或无成年子女外出”两类进行匹配，运用最近邻匹配法，对两组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获得进行匹配前和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如表6所示，较之匹配前，匹配后所有匹配变量的偏误比例皆有下降，且各变量偏误绝对值下降的比例均在68%以上。t检验结果表明，基本不能拒绝两个老年人样本组之间匹配变量差异为零的原假设，这意味着倾向得分匹配确实大大降低了两组样本老年人之间的差异。

表6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类型	所有成年子女外出	部分成年子女外出或无成年子女外出	两组差异 T 统计值	偏误比例 (%)	偏误下降比例 (%)
老年人性别	匹配前	0.614	0.520	4.90***	19.1	91.4
	匹配后	0.614	0.606	0.35	1.6	
老年人年龄	匹配前	66.936	69.182	-8.53***	-34.0	95.3

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吗？

老年人婚姻状况	匹配后	66.936	67.041	-0.64	-1.6	98.0
	匹配前	0.782	0.668	6.41***	25.7	
老年人受教育状况	匹配后	0.782	0.784	-0.12	-0.5	68.0
	匹配前	2.864	2.534	5.39***	20.6	
老年人收入	匹配后	2.864	2.758	1.34	6.6	73.4
	匹配前	1540.4	1263.4	1.54	5.7	
老年人健康状况	匹配后	1540.4	1614.1	-0.30	-1.5	-105.5
	匹配前	3.538	3.557	-0.58	-2.2	
子女平均年龄	匹配后	3.538	3.577	-0.95	-4.6	99.6
	匹配前	38.696	41.237	-9.69***	-38.5	
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	匹配后	38.696	38.686	0.03	0.1	99.2
	匹配前	4.829	4.19	11.25***	41.6	
老年人子女数量	匹配后	4.829	4.824	0.06	0.3	98.7
	匹配前	2.980	3.690	-12.28***	-49.9	
	匹配后	2.980	2.989	0.43	-0.7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与讨论

围绕“成年子女外出是否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这一问题，本文从孝道转型视角出发，基于 CHARLS 2015 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将成年子女外出状态划分为所有成年子女外出、部分成年子女外出、无成年子女外出三种类型，考察了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状态下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养老不同子系统的支持获得差异；比较分析了在不同自理能力状态下，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差异，以及成年儿子外出和成年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成年子女外出并未全面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一方面，因成年子女外出产生的空间分离效应降低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资源的可获得性，弱化了受空间限制的老年人家庭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受成年子女外出带来的增收效应或养老资源补偿效应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强化了不受空间限制的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

第二，老年人的自理能力状态是成年子女外出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获得的重要调节因素。在完全可以自理的老年人组中，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弱化效应非常稳健，对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强化效应比较稳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影响始终不显著。在自理能力受损的老年人组中，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弱化效应非常稳健，对农村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强化效应和生活照料的弱化效应比较稳健。较之对完全可以自理老年人的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对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度更大。对于自理能力受损的老年人而言，随着身体机能的弱化，其对生活照料的需求日益由弹性需求转变为刚性需求，而成年子女外出产生的空间分离效应往往会使农村老年人难以获得长期、及时的家庭生活照料。

第三，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子女外出状态性别差异。无论在何种外出状态下，成年儿子外出均显著强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显著弱化了家庭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无论在何种外出状态下，成年女儿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影响均不显著；成年女儿外出仅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健。较之成年女儿外出，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上述结论表明，儿子仍然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仅发挥着补充作用，而不是并列作用，更不是替代作用。

综上所述，成年子女外出导致的空间分离效应固然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但成年子女外出带来的增收效应以及家庭养老资源补偿效应强化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可见，一方面，成年子女外出并未全面弱化农村家庭养老支持或导致孝道衰落，而是推动农村家庭养老或孝道由“侍奉在侧”型向“成就安心”型转变；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在城乡人口大流动背景下，农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燃眉之急。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与农村养老有关的“三农”工作应在如下三个方面加强建设：

第一，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就地城镇化，兼顾“成就安心”式养老与“侍奉在侧”式养老。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到东部地区务工经商，导致这些地区出现严重的空心化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就地、就近城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为农村青壮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提供了更多机会，让成年子女可以兼顾就业与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既保障了成年子女行孝的经济基础，又克服了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弱化效应。为此，建议重点在城郊融合类村庄和集聚提升类村庄占比较高的县域，积极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和互助养老服务。需要指出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村镇都具备就地就近城镇化条件。如，撤并搬迁类村庄要么面临生态环境恶劣问题，要么存在人口流失严重导致的空心化问题。在这类村庄，青年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条件并不充分，不得不外出寻求生计。相应地，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服务的供需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为此，应积极应对撤并搬迁类村庄人口空心化趋势，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和互助养老服务，及时响应农村流动家庭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需求。

第三，大力倡导孝亲敬老美好家风，提升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水平。外出成年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支持不足，固然与其在城市谋生时面临的巨大压力不无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成年子女疏于问候、关心父母的借口。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较之物质养老，农村老年人对成年子女的精神养老需求越来越强烈。为此，建议大力倡导孝亲敬老美好家风。一是保障农民工正常休假权，鼓励其充分利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法定节假日和年休假，常回家看看，多在家陪陪父母。二是改善农村互联网通讯条件，加强农村老年人互联网通讯基本技能培训，引导成年外出子女充分利用电话、微信、QQ等通讯工具，加强与农村老年父母的日常联系。一方面，多向父母报

平安，与父母分享工作成就和生活经历，满足农村老年人“成就安心”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多对父母嘘寒问暖，满足农村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属”需求。

参考文献

- 1.白南生、李靖、陈晨，2007：《子女外出务工、转移收入与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地三个村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2.蔡蒙，2006：《劳务经济引致下的农村留守老年人生存状态研究——基于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的实证分析》，《农村经济》第4期。
- 3.陈彩霞，2000：《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应用霍曼斯交换理论对农村老年人供养方式的分析和建议》，《人口研究》第2期。
- 4.崔烨、靳小怡，2015：《亲近还是疏离？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人口研究》第3期。
- 5.杜娟、杜夏，2002：《乡城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人口研究》第2期。
- 6.杜鹰，1997：《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7.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8.高修娟，2014：《前台与后台：皖北农村“养老—送终”活动中的性别权力景观》，《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9.高瑞琴、叶敬忠，2017：《生命价值视角下农村留守老年人的供养制度》，《人口研究》第2期。
- 10.谷玉良，2018：《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11.贺聪志、安苗，2011：《发展话语下我国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福利之“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2.贺聪志、叶敬忠，2009：《农村留守老年人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13.贺聪志、叶敬忠，20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 14.贺雪峰，2008：《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第4期。
- 15.胡枫、史宇鹏，2013：《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 16.胡强强，2006：《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年人”照料》，《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
- 17.黄庆波、杜鹏、陈功，2017：《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代际关系的类型》，《人口学刊》第4期。
- 18.李全棉，2004：《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隔代家庭”初探——基于江西省波阳县的实地调查》，《市场与人口分析》第6期。
- 19.梁漱溟，2011：《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刘慧君、韩秀华，2014：《家庭结构变迁下新农保政策与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基于陕西省A市的调查》，《人口与经济》，第5期。
- 21.刘汶蓉，2012：《孝道衰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2期。

- 22.刘艳军、朱慧玲, 2007:《从全球化的视角解析当代青年“孝”之观念的现代性转变》,《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 23.卢海阳、钱文荣, 2014:《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生活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6期。
- 24.穆光宗, 2004:《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 25.马春华: 2016,《中国城市家庭亲子关系结构及社会阶层的影响》,《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 26.聂洪辉, 2017:《新生代农民工婚姻与农村家庭形态变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8期。
- 27.聂焱, 2008:《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女儿养老与儿子养老的比较分析》,《贵州社会科学》第8期。
- 28.潘光旦, 1993:《中国家庭之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9.舒玢玢、同钰莹, 2017:《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人口研究》第2期。
- 30.宋璐、李树苗, 2008:《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31.孙鹃娟, 2006:《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人口学刊》第4期。
- 32.唐灿、马春华、石金群, 2009:《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社会学研究》第6期。
- 33.田北海、雷华、钟涨宝, 2012:《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34.田北海、马艳茹, 2019:《中国传统孝道的变迁与转型期新孝道的建构》,《学习与实践》第10期。
- 35.田北海、王彩云, 2014:《城乡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家庭养老替代机制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 36.王彦方、王旭涛, 2014:《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养老模式选择的多因素分析——基于对留守老年人的调查数据》,《中国经济问题》第5期。
- 37.王跃生, 2013:《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第12期。
- 38.望超凡、甘颖, 2019:《农村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39.辛妍, 2012:《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的双重影响与政策选择》,《经济与管理》第11期。
- 40.叶敬忠、贺聪志, 2009:《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第4期。
- 41.张驰、向晶、施海波、吕开学, 2019:《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 42.张翠娥、杨政怡, 2015:《分歧与妥协——农村女儿的分离式养老》,《人口与经济》第5期。
- 43.张文娟、李树苗, 2004a:《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中国软科学》第8期。
- 44.张文娟、李树苗, 2004b:《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统计研究》第5期。
- 45.张烨霞、李树苗、靳小怡, 2008:《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当代经济科学》第1期。
- 46.钟曼丽, 2017:《农村留守老年人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湖北社会科学》第1期。

- 47.钟涨宝、杨威, 2017:《原生家庭偏好、现代性与农村女儿家庭养老》,《学习与实践》第4期。
- 48.周祝平, 2008:《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人口研究》第2期。
- 49.朱明宝、杨云彦, 2016:《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迁与低生育水平强化——来自湖北省宜昌市的经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50.Adhikari R., Jampaklay A., and Chamrathirong A., 2011,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 behind”, *BMC Public Health*, 11(1): 143.
- 51.Antman F., 2010, “Adult Child Migration Affect the Health of Elderly Parents Left Behind in Mexico”,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3): 205-208.
- 52.Bengtson, V.L., and Robert, E. L.,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3(4): 856-870.
- 53.Cong Z., and Silverstein M., 2014, “Parents preferred care-givers in rural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Ageing and Society*, 34(05): 727-752.
- 54.Guo M., Chi I., and Silverstein M., 2009,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Chinese Rural Elders with Migrant Children: Do Sons' or Daughters' Migrations Mak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52(5): 534-554.
- 55.Hugo G., 2002,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1: 13-46.
- 56.Luo B., and Zhan H., 2012, “Filial Piety and Functional Support: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mong Families with Migrate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geing International*, 37(1): 69-92.
- 57.Miliades H. B., 2002,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an adult child's emigration on non-immigrant Asian Indian elderly par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7(1): 33-55.
- 58.Silverstein M., 2008,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5(1): 6-25.
- 59.Velkoff V. A., 2001,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Well-being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 42(1):1-11.
- 60.Wilensky. H. L., 2002, *Rich Demographics: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91.
- 61.Xie, Y., and H. Zhu, 2010, “Do Sons or Daughter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1): 174-186.
- 62.Yang, H. Q., 1996, “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8(2): 404-415.
- 63.Zimmer Z, Korinek K, and Knodel J., 2008, “Migrant Interactions with Elderly Parents in Rural Cambodia and Thailan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3): 585-598.
- 64.Zimmer Z, and Kwong J., 2003,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Demography*, 40(1): 23-44.

65.Zúñiga. E, and Hernández. D., 1994, "Importancia de Los Hijos en La Vejez y Cambios en El Comportamiento Reproductivo (Estudio en Tres Comunidades Rurales de México)", *Estudios Demográficos y Urbanos*, 9(1): 211-236.

(作者单位: ¹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

² 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光明)

Does the Migration of Adult Children Weaken Fami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An Analysis Based on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ian Beihai XuYa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lial piety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uses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adult children's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different subsystems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ARLS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adult children's migration weakens fami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from the aspects of daily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which are restricted by space, but it strengthens the support from the economic aspect which is not restricted by space. Compared with the impacts on the elderly who can completely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the impacts of adult children's migration on the rural elderly with impaired self-care ability are more significant and stronger. Compared with the impacts of adult daughters' migration, the impacts of adult sons' migration are more significant and stronger.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dult children's migration does not comprehensively weaken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but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from "serving the parents by their side" to "comforting the parents with achievements". Adult daughters play an auxiliary role, rather than an alternative role in rural family support. Therefore,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rural elderly support system is to accelerate local urbanization, vigorously develop rural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mutual-care services among the rural elderly, and advocate a good tradition of family ethics and filial piety.

Key Words: Rural-urban Migration;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ilial Piety